

清代闽南刻书史述略

谢水顺

福建地处海隅，古代交通不便，而文化之孕育滋长，早已蜚声海内，夙有海滨邹鲁之称。历朝以来，通儒辈出，文坛艺苑之盛甲于东南。雕板印刷唐时已肇端倪，至宋朝十分发达，“建本几遍天下”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但是，研究版刻者，大都只提到宋建阳、麻沙，而对于建阳地区以外，特别是宋、元、明以后的福建闽南地区之刻书业，鲜有提及。本文拟就这个问题，于清代闽南版本作一概略之研究。惟所见极有限，意在抛砖引玉耳！

欲研究清代闽南的雕板印刷，需考闽南刻书业的刻板之始。建阳麻沙之刻书始于唐，盛于宋已为世人所公认，闽南之雕板事业起自何时呢？据《漳州府志》及其它文献记载，唐咸通年间，漳州就风行金石镌刻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碑刻。其中最著名的石刻碑为“尊胜陀罗尼经”碑，俗称“咸通碑”。是唐咸通四年（863年）漳州押衙王刚和他的母、妻发愿建造的。全幢高一八三公分，碑分八面，每一面广二十九公分，建州司户参军刘鏞书。《闽中金石志》等称之为“漳南金石刻文中之冠”。顾炎武在其“文字考”一文中，誉之为“天下经幢中第一”。因刘鏞书法遒劲，有晋人风致，碑一出，漳州一带名士争相摩拓，拓本风行远近。与“咸通碑”齐名的还有漳浦兴教寺僧元慧录记的“沈怀远

碑”，侍郎王珣撰书的“漳州三平大师碑铭”。前者刻于唐咸通二年（861年），后者刻于唐咸通十四年（873年）。两碑均为木刻，书法隽美，刻工精细，所惜木刻易朽，未能长久保留下来。

“三平大师碑铭”还有元末重修の木碑，是用樟木刻的，高约丈余，阔七、八尺，厚六、七寸，所鐫之王珣原文与万历年重立石碑同，惟末所附记者比石碑少了一百多字，可惜今亦无存。至于唐时闽南是否有印书业，目前尚缺乏可考的文献，但“沈怀远碑”与“三平大师碑铭”的开雕，证明了漳州地区在唐代就有了木板鐫刻，这一点已殊无疑义。另据《泉州府志》载宋代安溪县刻书称“印书局，在县治大堂之右。宋嘉定间，陈宓为令刊司马温公书议，唐人诗选。于此后，令周埭刊《西山仁政类编》、《安溪县志》、《竹溪先生奏议》、《庚戌星历封事集录》、《后村先生江西诗选》、《张忠献帖》、《陈复斋修禊序》、《文房四友》、《王欧书法》等书。”观此可知安溪宋代刻书之兴盛，那时的印刷量已相当之大了。泉州为闽南名邦之一，自唐代常袞观察振兴文教，欧阳行周开科以后，滨海古城，遂有家弦户诵的誉称。由于文化的繁荣，海外交通的发达，促进了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。泉州地区不仅能生产一般的纸张，而且能制造质量较高的上等纸，如鬲符纸就是当时的上乘。那时安溪已有专门的印书局，泉州更是刻本众多。著名的有宋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韩仲通刻本《孔氏六帖》，宋淳熙壬寅（1182）中和堂刻本《读史管见》，宋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泉州州学刻本《禹贡论》等。《禹贡论》由于鐫刻精绝，被称为：“纸墨精莹，如初榻黄庭。光采照人，为宋刻书中杰作。”综上述，可知闽南刻书乃从金石而至于雕板，从雕板而至书板，宋时刻书印刷业已有发展。所举虽陋，但其发展的线索，还是可以寻找的。

明清时代，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，是社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，从而影响到上层建筑学术文化上，也超过了前代。但是建阳

麻沙书坊自弘治十二年大火后，所有典籍书板尽付一炬，雕板印刷业即此一蹶不振。虽然到清初其业未废，但乾隆以后已少见闽北刻本流传了。而此时的闽南雕板事业，乃相沿不衰继续发展。据清乾隆二十八年重修的《泉州府志》和清乾隆三十年重修《晋江县志》及辛亥革命前由泉州书坊刊印的书籍，其刻工俱出泉州涂门近郊的村落，合计约有刻工三百余人。刻工的多少，反映着书坊营业的盛衰，可见清中叶后，泉州的雕板印刷还是很繁荣的。泉州的刻工主要出自涂门城外的田庵、淮口、后坂三个村落的专业艺人，特别是田庵一村为多。田庵村为洪姓聚族而居，他们的祖先自宋代从安徽徙泉，先从事金石镌刻，后专事雕板印书。田庵等三村落的刻板工艺与泉州书坊的开设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泉州的道口街为旧时木板书坊的集中地，其较有名的书坊有辅仁堂、绮文居、郁文堂、聚德堂、崇经堂等。其中以辅仁堂一家开业最早，藏板最多。其余各家也各拥有经、史、子、集、小说、医书、歌曲等大量书板。这些书板的镌刻多出城郊涂门外刻工之手。如清道光十七年刻本《归田稿》首蒋祥墀序末行就刻有：“泉州涂门外后坂社施唐培精刻”十三个字。该书半页九行、行十八字，小字双行字数同，白口，四周双边。长宋体，间隔疎朗字大悦目，刻印俱佳。

清末，辅仁堂因为家庭分产争执而关闭。接着聚德堂、崇经堂也相继倒闭，他们的书板多为绮文，郁文两坊所购，郁文堂购得辅仁堂板最多，他们在购得旧板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扩大了营业，绮文增设珠玉楼一肆，郁文也增设了经文一肆。同治，光绪朝，取士废八股，改用经义，史论，时务策。郁文堂为应时趋，新刻了许多经义史论的书，以满足当时文人的需要。此外，郁文堂也刊行日用参考书如《居家必用》之类，还刊行了不少的话本小说以应市井一般居民的需要。如《说岳全传》、《平闽全传》等。《平闽全传》六卷，五十二回，清光绪十一年刊。此书充满

方言，非漳泉人不解。故其刻本多流行福建厦语通行之地方，北方少见。书坊外，又有专门刻印《通书》、《历图》及“劝善”书籍的家庭作坊。这类书坊多以个人名字为号，如林雅坤坊，逐年都有新刻版本。

泉州地区除书坊刻本外，私家刊刻图书也很流行。如晋江龚显曾以“亦园”名义，在咸丰、同治间刊行了自己的著作《亦园胜牍》等十几种书。他还用木活字摆印了《籀经堂集》十四卷和《补遗》二卷、《聊中隐斋遗稿》二卷等，一时畅销全国。还有泉州的李廷钰，喜欢搜集古本来刊印图书。他在道光二十一年依宋本重刊的《陶渊明集》十卷，就很精美。书后跋称：“盖余此刊，志在复古，欲使昭明以来所传旧本广播艺林”。可谓用心良苦。李廷钰曾任过江西、浙江、广东潮州等镇总兵官，善诗文，工书画，恂恂有儒者风。他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回乡，移居泉郡，葺靖海侯废园居之，校订《汉唐名臣传》、《契丹国志考证》、《屏山全集》等，刻印精工，艺林称善本，为清季闽南书刻中之上品。在这期间，晋江回族丁拱辰在泉州刊行《演炮图说》。丁拱辰，字星南，清代著名的军火科学家。鸦片战争爆发时，他从海外经商回国，看到祖国受到侵略，义愤填膺，为了抗击侵略，他亲自设计并监制新式火炮。他所监制的大炮灵巧坚牢，操纵方便，是当时很先进的武器。他据自己多年研究积累的资料撰成《演炮图说》一书，于道光二十一年刊行；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丁拱辰对《演炮图说》进行了修订，也在泉州刊行，称《演炮图说辑要》。该书内容丰富，对各种火炮的操纵使用均有细述，特别是对英、法、美等国先进技术介绍尤详，图文并茂，通俗易懂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书。丁拱辰所从事的科技著述，比著名科学家李善兰，华蘅芳等早了十多年，称得上我国近代军火科学的先驱。

与泉州毗邻的龙溪地区，在那时也刻过不少书，仅福建省图书

馆就收藏了三十几种。如清乾隆十五年海澄郭氏重刻明黄道周撰《榕坛问业》十八卷；清乾隆二十七年海澄县衙刻本《海澄县志》二十四卷；清嘉庆十六年龙溪林氏稻香书屋刻清林象撰《易堂文抄》二卷；清道光四年龙溪虚受斋刻清郑琮撰的《樗云诗抄》五卷；清道光六年龙溪二十八都东山书院刻《布衣陈先生遗集》四卷；清光绪五年龙溪林维源刻清吕世宜撰《古今文字通释》十四卷；清光绪二十五年漳州多艺斋刻清蔡世远撰《二希堂辑斋文诗合编》二十二卷；清光绪二十三年漳州素位堂刻宋高登撰《高东溪先生文集》等。这里还要提到的是“味古书室”在道光年间所刊行的许多书。“味古书室”为龙溪孙云鸿的书斋名。孙云鸿，字仪国，做过苏淞、福山等地水师总兵，曾参加过《厦门志》的编纂。“味古书室”所刻本以《正气堂全集》为佳。《正气堂全集》是明代御倭名将晋江俞大猷所著，收了俞氏的策论、诗文、案牍、正、续、余集合二十七卷，和《镇海南议稿》、《洗海近事》二种，这是研究俞氏毕生事迹和明代御倭战争的重要文献。福建省图书馆和厦门市图书馆所收藏的《洗海近事》，就是全集刻本的单行本。

明末清初，郑成功开府思明，厦门人才荟萃。池显方、阮旻锡、卢若腾及其后数十家文章诗词诸般著作如林，为厦门的刻书业提供了充足的书源。厦门书坊就地取材与作者合作刻印了许得质量较高的书籍。象池显方的《晃岩集》，张锡麟的《池上草》，薛起凤的《梧山草》、黄日纪的《嘉禾名胜记》等，都是很难乾的本子。《嘉禾名胜记》是厦门最早的一本导游手册，刊刻于清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，所收录的诗词文章都是研究厦门文物的重要参考资料。黄日纪，号荔厓，原籍龙溪，为厦门名士。他工诗善文，娴于书法，对厦门名胜古迹尤感兴趣。他花了八个月时间去搞考察，积累了大量资料，在张廷仪协助下，编辑成书二卷，蔡新、薛起凤各为其作序。薛序称：“今秋（丁亥年）议修

邑乘，余有分辑之役，而先生适著《嘉禾名胜记》，互相考订，甚资丽泽之益。”这是说，乾隆三十二年正是吴鏞倡修《同安县志》时，薛起凤参与其事，因有《嘉禾名胜记》付梓，丰富了他修志的资料，可见黄日纪编辑这部书，在保存文献上有贡献。该书刻本流传较少，福建省仅同安县图书馆珍藏壹部，已收入全国善本书总目。

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《厦门志》开雕。隔年，《厦门志》总纂周凯所著的《内自讼斋文集》也在厦门刊刻出版。在这期间，厦门名士吕世宜也用书斋“爱吾庐”为名刊印了《爱吾庐笔记》、《爱吾庐文钞》等流行。在道光间比较重要的刻本还有林树梅的《嘯云文抄》和《嘯云诗抄》，两抄均刻于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。林树梅，金门人，道光年间曾在台湾做官，很熟悉福建、台湾情况。诗抄中有不少地方史料作品，如“厦门书事”等。文抄里还收有陈化成、李长庚等人的传记，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叶闽台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林树梅还校刊了明卢若腾的《岛噫集》。卢若腾也是金门人，崇祯庚辰进士，官至兵部主事，后来投郑成功居住厦门。他的诗多描写现实生活，林树梅得到抄本，精心核订，刻印传世，使我们今天还能读到它。这时期在厦门流传的刻本还有清龙溪人官献瑶所撰的《官石溪文集初刻》三卷，这是福州王兴源在台湾刊印的。在正文第三卷末页末行鐫有“福省王兴源在台湾刊”九个字。该书每半页九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楷书写刻，间隔疏朗，刻印称佳。

厦门的书坊，多集中在二十四崎顶，有文德堂、芸成斋、会文堂、瑞记（后改名萃经堂）、崇雅堂、倍文斋等十几家。道光以后，这些书坊所刊刻的日用参考书和医书等很受市民的欢迎。这一时期，文德堂还编写刊行了许多通俗绣像小说和历史故事。就所目见，有《水石缘》、《白圭志》、《北魏奇史闰孝烈传》、《混唐平西传》、《平闽全传》（亦有鹭江崇雅堂道光元年

(1821年)本)、《平妖传》(咸丰十一年刻)等。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文德堂于咸丰年间所刊沈储著的《舌击篇》六卷,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咸丰年间闽南小刀会起义,是历史上一件大事,沈储参加清军镇压小刀会起义,把所积文牍编成《舌击篇》。它虽是反面材料,却是研究小刀会起义的第一手史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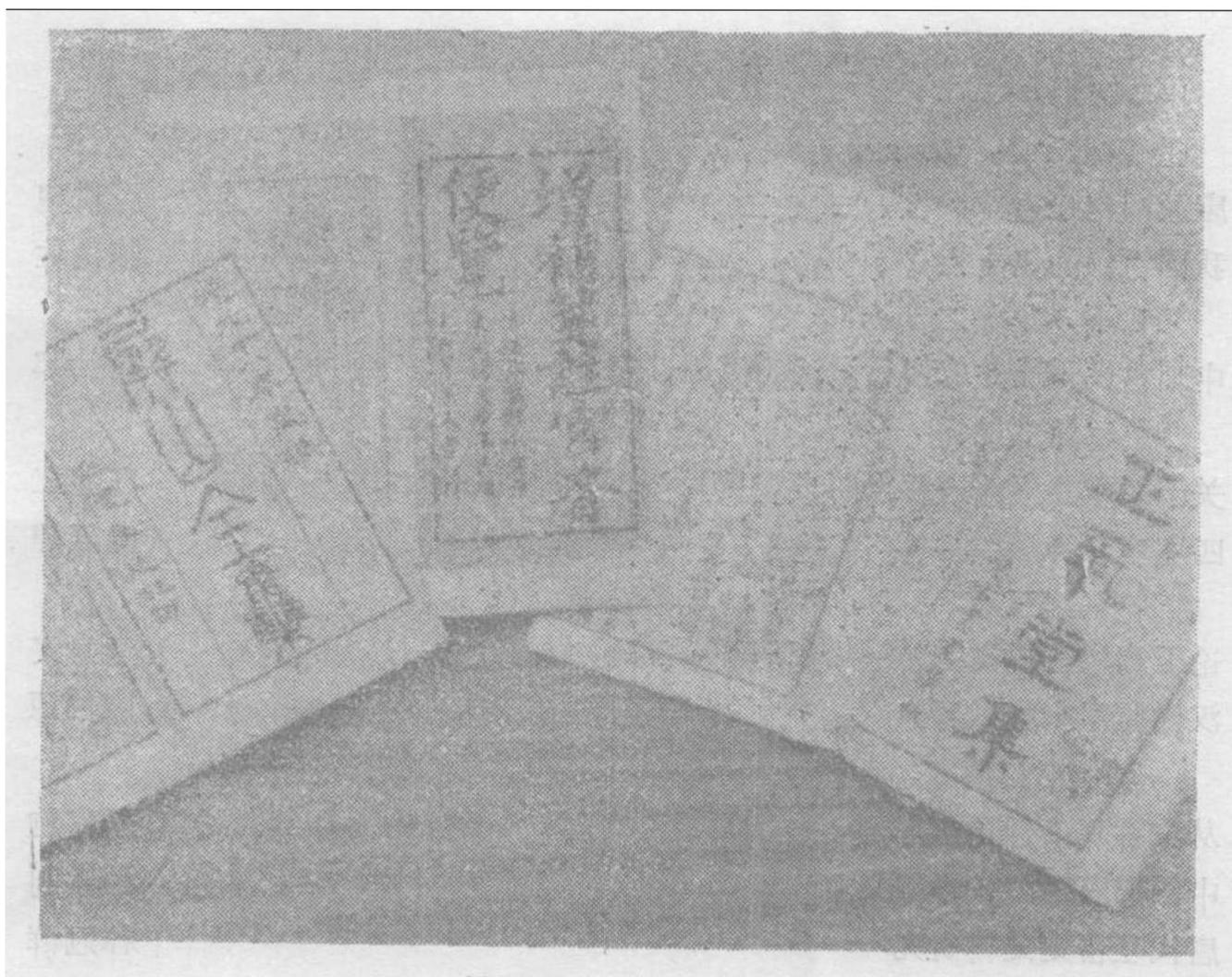
同治年间的厦门私家刻书中,霞溪仔吴家刻有吴葆年的《绘秋楼诗抄》,吴兆基的《小梅诗存》等。同安徐氏刻有夷狄散人著《平山冷燕》、澹园主人著《孙庞演义》和不题作者名的《玉娇梨》等小说。苏廷玉刻有《苏魏公文集》七十二卷(道光二十二年重刻本,咸丰间重印本)。

厦门的清代刻本,不论官刻私刻,版本一般都比较较好,字体以宋体字即匠体字为多,间也有用行、楷、隶来书写的。厦门雕板技工,有一部分是从泉州过来的。道光丙午年(1846年)厦门芸成斋刻本《四书补注附考备旨》,序言页末空白处就有两行小字“福建泉州府涂门外田庵乡洪文畅督刻”。这牌记说明了泉厦两地的雕板工人是互相交流的,也证明乡先贤所称厦门刻本的刻工来自泉州的说法是可信的。清光绪二十八年,厦门大火,书坊藏板大部分和私家刻本在大火中化为灰烬;所余书板又在抗战中全部烧光,数百年精华,毁于一旦,诚为闽南文化史上莫大之损失。

以上所说,只不过是闽南刻书史的简略叙述。闽南刻书业之所以能在清代持续不衰,有它的社会经济原因和历史条件。闽南地处沿海,经济繁荣,泉州厦门等地海滨邹鲁遗风,封建文化发达,人文荟萃,名家著作如林。笔者曾据《龙溪县志》、《同安县志》、《厦门志》、《晋江县志》作一粗略统计,有清一代单这四县的作者就有456人、作品851部,自诗文集到经解、史书、杂著、戏曲、小说等无所不包,为雕板印刷提供了充足的书源。雕板印书所需的本材和纸张又正是本省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特

产。水陆交通路线的通达，更是便利了书籍市场的扩大。泉、漳、厦的雕板技术工人众多。清同治间，省城于正谊书院设局重雕《正谊堂全书》，特徵匠于南郡。正是由于有闽南刻工的参加，《正谊堂全书》四百七十八卷仅岁余即告刊竣，足见南工技术之熟练。由于闽南技术力量雄厚，故能满足坊刻、官刻、家刻、私刻等各种需要，有清一代闽南书籍流行省内外远及台湾，日本等地，自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福建省图书馆



清代闽南版刻书影